

# 数字游民乡村嵌入的模型、图景及反思<sup>\*</sup>

——兼论数字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

王忠林珑

**摘要：**数字游民通过加强城市多元资本与乡村在地资源的协同创新，促进了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发挥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由于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的程度以及对乡村社会内生性要素利用程度存在差异，数字游民表现为“高关系—高利用”“高关系—低利用”“低关系—高利用”“低关系—低利用”四种类型。该群体在乡村场域中呈现多元实践样态，并在城乡空间重构和个体价值重塑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体自由追求与乡村发展需求的双向奔赴。未来应有序引导各类型数字游民有效嵌入乡村，充分尊重和发挥数字游民的主体性作用，保障数字游民与乡村社会长期互利共生。

**关键词：**数字游民 嵌入性 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 中国式现代化

##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现阶段，大量农村人力资源向城镇转移，乡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凸显，亟须推动多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在数字技术深度重构社会运行规则的当下，以数字游民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力形态应运而生，其凭借数字技术与信息资本所赋予的脱域能力进行全球流动，流动模式通常呈现为“全球北方—全球南方”与“城市—乡村”双重特征。<sup>①</sup>这不仅为数字游民进驻乡村提供了机会，也为破

解城乡要素流动梗阻、培育乡村建设新动能提供了可行路径。那么，数字游民如何与乡村社会建立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实现自身发展？不同类型数字游民的差异化实践又将对乡村可持续发展产生何种结构性影响？

新经济社会学肇兴以来，“嵌入性”成为分析组织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间关系的重要范式。传统嵌入研究多聚焦静态地域共同体中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的过程，而数字游民群体的流动性特征则对嵌入性理论提出了新思考：当行动者不再固着于特定物理空间时，其与乡村社会的联结机制将呈现何种新形态？换言之，这需要将传统意义上对地域和边界的考量转向对网络和关系的思索，而对这种网络和关系的研究是聚焦和围绕

\*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项目号：23ZDA081）、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2023年开放性课题“文化互鉴与文明创新——来自澳门的历史与经验”（项目号：IGUC23B007）、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2023年开放性课题“城市文明典范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项目号：IGUC23A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I. Reichenberger, “Digital Nomads: A Quest for Holistic Freedom in Work and Leisure”, *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 Vol. 21, No. 3, 2018, pp. 364–380.

“人”展开的。<sup>①</sup>因此,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围绕数字游民的乡村实践可以展开如下讨论:一是分析数字游民乡村嵌入类型,探讨其嵌入乡村社会过程中的主体性实现模式;二是反思数字游民嵌入乡村何以可能,为提高数字游民的劳动福祉与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学理依据。这既有助于拓展嵌入性理论关于流动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动态互嵌的解释边界,亦是对城乡融合发展及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积极回应。

## 数字游民与乡村嵌入性

### (一)数字游民的定义与特征

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大卫·梅乐斯(David Manners)在《数字游牧》一书中,首次提出数字游民的概念,并预测随着新技术对实践的渗透,人类可以像游牧者一样生活,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sup>②</sup>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快速变革,数字游民克服地理空间的束缚,凭借线上工作,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旅行。这种流动性与远程性的状态是数字游民基于自主意愿的长期性选择,审美和休闲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数字游民的核心关注点并非旅游活动,而是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学习与工作。

“成功的”数字游民有能力摆脱传统“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灵活选择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通常情况下,数字游民涵盖不同职业背景,包括从事远程工作的自由职业者、能够在任何地点开展工作的公司职员以及自主参与各类活动的个体从业者。因此,有研究将数字游民定义为利用数字技术的虚拟属性,使自身摆脱特定时空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依托互联网从事知识生产、内容输出与经营管理,从而在尽享工作自主性的同时赚取收入的劳动实践群体,<sup>③</sup>强调充分利用信息传播与数字平台的便捷性打造一种全新的数字化

生活方式。

综合前述关于数字游民的讨论,入驻乡村的数字游民的一般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摆脱传统职业的时空规训,逃离现代都市,追求“诗与远方”,实现深度数字生存。(2)流动频率由个人需求决定,停留乡村地区的时长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3)职业背景具有异质性,涵盖信息技术、创意服务、在线教育培训等多个工种。(4)群体构成多元化,既包括科技与创意工作者、数字创客、从事数字兼职的青年学生等外源型群体,也包括依赖互联网进行远程工作的返乡青年等本土型群体。

### (二)数字游民乡村嵌入的分析架构

“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领域的核心理论范式,由著名学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提出,认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过程,嵌入社会之中且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sup>④</sup>在此基础上,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将其用于考察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认为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几乎人类所有行为都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受到社会关联的影响,<sup>⑤</sup>由此明确了关系、结构、文化等社会性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进一步地,他将个体视为嵌入具体的且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行动者,其行动受到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的影响。他认为,经济行为者之间存在二元关系,并可划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两种类型:与强关系的同质性信息相比,弱关系能够跨越不同的阶层,获得不同圈层的广泛信息。<sup>⑥</sup>可见,嵌入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成为信息传递的渠道,嵌入网络的行动主体在信息交换过程中会形成伙伴关系。

根据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从一定的经济行为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相适应的视角出发,数字游民嵌入乡村的分析可以从

<sup>①</sup> 孙信茹:《流动与嵌入:数字时代媒介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实践与拓展》,《新闻界》2024年第4期。

<sup>②</sup> T. Makimoto, D. Manners, *Digital Nomad*, Chichester: Wiley, 1997, pp. 15–36.

<sup>③</sup> 王云龙、文军:《在不确定中构建自主性:数字游民的日常劳动实践及其反思》,《浙江学刊》2024年第1期。

<sup>④</sup>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sup>⑤</sup> M.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1985, pp. 481–510.

<sup>⑥</sup> M.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1973, pp. 1360–1380.

两个角度同时切入:一是行动主体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的程度(强弱关系);二是行动主体利用乡村社会内生性要素的程度。故而,可以构建“社会关系(强弱关系)一主体行动作用(乡村社会内生性要素利用程度)”的分析框架,将数字游民划分为四种类型(见图1):“高关系—高利用”的高度嵌入型;“高关系—低利用”与“低关系—高利用”两种中度嵌入型;“低关系—低利用”的低度嵌入型。其中,“高关系—高利用”数字游民拥有广泛且强大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高效利用乡村社会的内生性资源(如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参与乡村建设,其生产活动主要基于本地文化和市场规则运作,对所在乡村有较强的利益联结与情感连带。“高关系—低利用”数字游民虽具有高度的在地情感联结,但对当地资源和机会利用程度较低,主要凭借自身的“高关系”属性拓展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主体资源的衔接作用。“低关系—高利用”数字游民虽与乡村社会网络联系程度较低,但可以生产、传播和消费乡土文化,创造新的乡村经济增长点。“低关系—低利用”数字游民则尚未深度利用乡村资源与介入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他们习惯在不同地区间频繁迁徙以追求不同地域文化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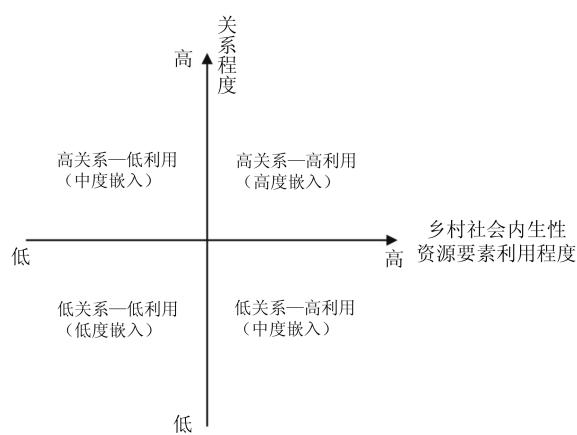


图1 数字游民乡村嵌入的类型

### 数字游民乡村嵌入的现实图景

运用“社会关系—主体行动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调研数字游民在乡村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互动模式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可以展现该群体在引导城乡资源跨域互动、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

络、助力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多维图景。

#### (一)“高关系—高利用”:资本联结与文化重塑

具备“高关系—高利用”特质的数字游民,能与乡村社会保持持续有效的交往互动,加速乡村社会转型。这类群体既包括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内生型返乡精英,也包括与村民建立高度信任关系的其他群体。一方面,他们与乡村联结性较强,能够利用乡村的独特资源和社会网络,刺激乡村经济从传统生产主义范式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乡村产业发展,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空间,促进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乡村的地方文化情境孕育的政府行政逻辑、产业市场逻辑是数字游民行动部署的关键影响因素,其各项活动以地方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及产业背景为基础,深度扎根乡土,紧密嵌入乡村社区。具体而言,“高关系—高利用”数字游民的乡村实践模式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要素,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重点培育乡村文化产业、特色产业,增强乡村经济的造血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形态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二是整合挖掘乡村资源要素,构建乡村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包括利用乡村自然资源、闲置土地、生态环境,推动村域土地功能调整与分区优化,打造消费型物质空间;根植于乡村传统文化形态,以新的展示载体和形式构建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消费文化交融共存的文化空间;基于多元利益主体,推动乡村社会关系空间从依赖血缘、地缘的差序格局逐渐转变为依赖业缘、趣缘和契约关系的现代多元网络格局。三是打破城乡之间的文化隔阂,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人、以文兴业,充分发挥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先进文化在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品质及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

#### (二)“高关系—低利用”:情感回归与潜力拓展

数字游民回归乡村既有情感的驱动,也有对现实生活的考量。一方面,对农村社会的乡土情怀和对乡村文化情境的眷恋促使一些人回到故乡,实现“嵌入性”情感回归;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内卷”与乡村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因素也推动着他们重回乡村。“高关系—低利用”数字游民

看重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的情感联结,享受乡村沉浸式“慢生活”,但参与乡村发展建设意愿不足,未能或不愿利用乡村内生性资源要素,容易成为乡村建设中的旁观者。这对于乡村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加速流动,加上乡村生活主体长期缺场的影响,乡村社会结构逐渐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异化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但其本质依旧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差序格局”形式。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规则下,人们最初的信任是血缘关系信任,属于先赋性的关系信任,而之后的信任则基于这种先赋性的关系信任进一步扩展和演变。<sup>①</sup>“高关系”数字游民独特的身份优势有助于获得当地居民的信任与支持,从而规避业务推进中潜在的矛盾与误解。因此,推动“高关系”数字游民利用圈层信任发展在地化的业务不但重要,而且具有优势条件。正如格兰诺维特所言:“当个人通过社会纽带连接相互分离的多个网络时,那将享有极大的战略优势。”<sup>②</sup>这就需要着力思考如何强化此类群体的在地关系和情感纽带,有效激活他们参与乡村发展的潜能。

### (三)“低关系—高利用”:文化传播与掠夺式利用

“低关系—高利用”数字游民往往注重挖掘和整合乡村优秀文化资源,借助现代生活观念引入、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及艺术启蒙等路径,通过举办艺术节、乡创节庆、文化旅游等系列活动,实现对文明传统的再追索和对当下乡村社会文化的再修复。例如,KAKA 青社展览的《破次元壁——夹缝中的惊奇》,以“艺术振兴乡村、艺术点亮乡村”为构思,对外再现泽雅宝贵的地理、文化、民俗资源;UniX 数字游民团队扎根于乡野,开启《青海尖扎空中草原艺术周》活动,帮助当地村民深化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培育乡村现代生态文明理念。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游民作为一种跨文化行动者,对地方文化资源“高利用”的行为往往带有

一定程度的“掠夺”性质,容易忽视文化持有者的权益,导致不平等获取或过度开发当地文化资源的问题。从这种行为的后果来看,文化不再局限于单一社会群体的再生产,而是转变为可流通或被异质群体选择和占有的资源。在这种现代文化的“入侵”影响下,当地居民容易产生如“被利用”等不满或不适心理,致使他们难以恢复或维持独立自信的文化神态和从容仪态,造成文化生态失衡、文化传承弱化、文化情感淡化等问题。长期以来,乡村文化振兴主要依赖基层政府的“单轮驱动”,数字游民固有的文化优势在乡村实践中缺乏施展空间,容易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处于被动地位。如何在尊重和保护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和谐共生,成为推动该群体融入乡村发展的关键问题。

### (四)“低关系—低利用”:生活体验与空间生产

传统乡村囿于媒介资源稀缺与表达渠道狭窄,长期处于传播秩序的边缘地带。在数字技术赋权背景下,数字游民的流动性实践为突破这一困境提供了契机。尽管“低关系—低利用”数字游民乡村社会关系较弱,且对乡村资源的利用程度较低,但对于乡村社会的积极影响仍值得关注。他们经常“打卡式”参与乡村文化传播,即短暂停留以欣赏在地风景与体验乡村文化,通过这种具身性体验完成自我身份展演,并借助社交媒体将乡村景观转化为可供消费的符号资本。媒介的意义不只在于文本和内容,也在于媒介驱使人们采取了何种行动,催生出何种独特的传播样态并由此发生何种改变。因此,媒介成为“低关系—低利用”数字游民消费活动中的生产要素,多模态地再现乡村的地方空间,构建媒介化的乡村社会。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空间的生产”概念,揭示了空间不是背景而是生产要素本身,即“(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强调空间中存在着社会关系。<sup>③</sup>就旅游空间实践而言,空间化指向在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生活空间”以及在社会关

<sup>①</sup> 舒洪磊:《个体性嵌入:基层政府结对治理实践中的互动关系及情感逻辑》,《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sup>②</sup> [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利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sup>③</sup>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 31–39.

系生产过程中构建起来的“空间性社会结构”。<sup>①</sup>资本通过构想和规划旅游空间的“符号”和“图像”,可以实现对旅游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助长旅游者的文化消费行为。许多数字游民,如旅游网红、美食博主以及视频主播等运用媒介化手段,生成“旅游空间的再现”图景,在强化乡村地域特色产品和文化宣传推广及营销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数字游民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合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然而数字游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是复杂的、艰巨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主体性概括为一种激励自我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的理性方式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数字游民脱离固属的传统社群——家庭、工作单位、传统城市社会,将乡村地区作为生活和工作场所的原因。然而,在这种浪漫的光环背后,也存在因灵活就业的特殊属性与身份的模糊性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收入等缺失或不稳定,从而使数字游民时常处于一种不断流动但又渴望安定的矛盾状态。一些人在乡村找到了“归属感”,另一些人则没有,甚至一些数字游民会突然结束旅居,回归传统职场生活。此外,我国不少乡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公共服务不足,数字游民在当地工作和生活往往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难以持续激发他们扎根乡村并服务乡村的意愿,造成数字游民在参与乡村建设中的“脱嵌”状况。

### 数字游民乡村嵌入的反思

数字游民的乡村在地实践证明,这些乡村游牧者可以嵌入乡村社会网络并能动地转化城乡资源要素,反映出数字时代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多重关联及辩证互构的动态过程。传统嵌入性理论更多关注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数字游民的乡村嵌入则不唯如此,还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地域资源流动和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

关系。这种新型嵌入模式打破了嵌入性理论中静态化、本地化的预设局限,揭示了流动社会中的新型嵌入范式,也为城乡融合发展与人类福祉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 (一)从“全球城市”到“全球乡村”:城乡融合发展

随着全球普遍进入“都市社会”,<sup>②</sup>城市作为资本全球布展基本空间单元的地位开始凸显,世界也日益呈现为一个全球城市体系。<sup>③</sup>在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看来,全球城市系统是一个具有广泛联系和影响区域发展的城市网络,行动实践能够在流动空间的作用下有效汇聚起来。<sup>④</sup>作为全球性与地方性、乡村性与都市性之间不断协商和重构的混杂变体,乡村地域系统镶嵌于由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网络构成的系统结构之中,不断生成多主体、多维度、多文化混杂的网络化空间。与此同时,全球化和城市化时代休闲消费的乡野取向催生了全球乡村(Global Countryside),强调“发达”和“发展中”世界农村地区的相互联系,驱动乡村经济结构、社会阶层与土地利用景观的演替。不宁唯是,地方行动者既是全球乡村重建的核心力量,也是保持地区独特性的实践主体。数字游民在回应乡村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其身份认同、价值归属和意义感来源皆呈现出开放性与融合性特征,并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城乡融合式的文化形态。田园牧歌式的场景属性被融入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之中,且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被叠加于其原先的生产方式之上,由此产生了新的城乡融合的生产生活方式。<sup>⑤</sup>因此,数字游民投身乡村建设的本质是行动主体、资本以及思想观念直接嵌入乡村具体情境,进而引起乡村要素重新配置及乡村社会关系重构,并持续驱动乡村空间再生产。这一现象揭示了城市价值模式如何映射到乡村地区的过程,乡村由此成为全球城市链条中的一环。与此同时,乡村也将以其特殊性而成就其“全球性”,为推进城乡

① 郭文:《空间的生产与分析:旅游空间实践和研究的新视角》,《旅游学刊》2016年第8期。

②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③ 赵强:《走向全球城市命运共同体:都市时代全球化与城市化关联的哲学反思》,《江海学刊》2022年第6期。

④ M.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10, pp. 407–460.

⑤ 沙垚:《流动作为方法:数字游民在中国乡村——以光山数字游民基地为例》,《新闻界》2024年第4期。

协调发展提供兼具经济可行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实践样本。

## (二)从“刚性约束”到“弹性调控”:人文价值导向

在数字技术重构劳动形态的当代语境下,传统雇佣制度下以考勤打卡、固定场所为表征的刚性约束体系,正被云端协作、地理套利等弹性调控机制所解构,数字游民现象折射出从工业文明刚性时空规训向数字时代弹性生存策略的深刻转型。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与文化人,不仅是生物性存在,更是关系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sup>①</sup>数字游民的生活并非一场随心所欲的散漫工作旅行,它强调凭借可自由支配的流动能力,有计划地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本获取自我感知舒适的生活环境,探寻情感归属和群体认同。因此,该群体将资金、技术、信息与市场等资源要素外溢于乡村场域的过程,既凸显了灵活且自主的新劳动模式,也体现了基于地方的情感联结。实践表明,数字游民可以在全球市场中寻求工作的灵活性、自主性以及适配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空间——包括物质和虚拟空间并以此创造社交、工作和情感的集体舞台。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认为,“每一种全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可展示出一种真实且全面的空间结构化”,<sup>②</sup>它表示的不是空间中关系的一种新重组,而是一种新空间的创造。受交通革新与数字技术发展的时空压缩效应影响,数字游民群体基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在新的“时空”中以多样化的方式流动和集聚,持续重构其与乡村社会网络之间的交互模式,并为乡村社区提供发展转型的机会。这也成为人文经济学中探讨个体需求、价值观念以及文化背景如何影响并塑造经济行为观点的现实写照,强调了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以及经济发展要致力于满足

人的个性、尊严和理想价值等精神需求。<sup>③</sup>

## (三)从“经济产出”到“人类福祉”:人的全面发展

在当前的“液态社会”中,数字游民这种看似快乐至上的生活方式并不等同于他们获得了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摆脱传统束缚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独立地面对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sup>④</sup>但对他们来说,经济并不是唯一的行动逻辑,关键在于主体本身对生活意义的觉醒。数字游民回到乡野,摆脱传统的、受地点限制的工作模式,更加注重通过高质量的成果来建立和维护专业声誉,并以自身的技术、资本寻求多元化的生计途径,在“游牧”中寻求心理平衡和自我认同,反映了对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的不断追求。劳动幸福意味着劳动者成为自己社会劳动的主人,实际地参与劳动的社会管理,能够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平等分配和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sup>⑤</sup>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游民这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体现了劳动主体自主性能力的确立,凸显出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不谋而合。玛莎·C. 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进而提出了关于人的自主性的“实质性自由”议题,指出“实质性自由”是指通过可行能力选择自己所珍爱的生活。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发展出一定的可行能力——人们实际上能够做什么或者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他就难以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sup>⑥</sup>在数字时代,数字可行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时代的个体能否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能否拥有实质的自由和发展的机会。正如数字游民,他们在数字化变革中实现自我赋能,试图克服当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局限,在生存与生活之间努力做到平衡,昭示着劳动自由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一种前景。

<sup>①</sup> 徐龙建:《论人文经济学的民本意蕴与推进机制》,《江南论坛》2024年第4期。

<sup>②</sup> D. Massey,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p. 34.

<sup>③</sup> 李程骅:《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中深化人文经济学实践》,《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sup>④</sup> 虞鑫、李一诺:《寻找失落的附近:数字游民的流动社交与空间实践》,《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12期。

<sup>⑤</sup> 袁祖社:《实践理性视域内“资本逻辑”和“劳动幸福”的关系辩证——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与可行能力”的理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sup>⑥</sup> C. N. Matha,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70.

## 结论与讨论

数字游民从城市到乡村的自发性流动体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这一过程不仅是城乡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更是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在城乡之间深度嵌入与协同演进的体现。为推进数字游民与乡村社会的深度融合,应构建分层管理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与推进城乡文化共融共生。一是实施差异化策略,有序引导各类型数字游民有效嵌入乡村。“高度嵌入”的数字游民是乡村振兴有效主体的理想类型,须以适当政策激励其整合乡村内生资源并进行再生产活动。重视“中度嵌入”数字游民中返乡精英的“强关系”纽带作用,引导这一群体依托其城乡双重社会资本的独特优势,发挥好上下沟通和外源内引的桥梁作用,借此维系“弱关系”,推进“强关系”“弱关系”的协同共建。针对“低度嵌入”数字游民,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并设计如“数字游牧+乡土记忆”的文化互动体验项目,提高他们与乡村之间的依恋和契合度以增强在地黏性。二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创新人才制度机制,保障数字游民与乡村社会长期互利共生。三是深化区域文化教育与互动,帮助数字游民与当地居民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增进理解与认同。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城乡文化融合共生的良好生态,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实现城乡文化协同发展。

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在本质上指市场与

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但过多强调经济行动受到社会因素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自主性。而数字游民是具有自觉的主体性的群体,如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所描述的那样,“通过流动,民众重新夺取了空间,将其自身组成一个积极的主体”。<sup>①</sup>作为乡村发展中的新资源要素,数字游民的“嵌入”本质上是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和共同成长的过程,他们通过整合乡村内生资源并能动地进行再生产,既为寻找和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可能,也通过赋能传统产业升级、重组生产关系等方式形成新质生产力,为乡村及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由于数字游民过度无序化的流动对乡村建设构成一定的挑战,因此,应通过分类引导、政策供给、文化涵化等一系列措施予以鼓励、支持与磨合,在保障当地居民权益的基础上推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促使数字游民从自我实现向社会创新转化。数字游牧或将发展成一种稳定的新兴生活与工作形态,这对于顺应时代变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深度融合以及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忠,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林珑,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战焰磊]**

<sup>①</sup>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1页。